

毛泽东著作选读

甲种本



人 民 出 版 社

06.2
149
: 1(2)

毛泽东著作选读

甲种本

(下)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4/04

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

(一九四二年五月)

引 言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同志們！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談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在我們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綫，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两个战綫，这就是文化战綫和軍事战綫。我們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軍隊。但是仅仅有这种軍隊是不够的，我們还要有文化的軍隊，这是团結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五四”以来，这支文化軍隊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漸縮小，其力量逐漸

削弱。到了現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謂“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說，反动派有的是錢，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綫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績的部門。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內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結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軍隊从中隔断了緣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說就已經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結合了。我們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結合起来。我們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組成部分，作为团結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應該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态度問題，工作对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学习問題。

立場問題。我們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場。对于共产党员來說，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

場，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場。在这个問題上，我們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認識不正确或者認識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許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場。

态度問題。随着立場，就发生我們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說，歌頌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問題。究竟那种态度是我們需要的？我說两种都需要，問題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統一战綫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鋒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們的殘暴和欺騙，并指出他們必然要失敗的趋势，鼓励抗日軍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們。对于統一战綫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們的态度應該是有联合，有批評，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評。他們的抗战，我們是贊成的；如果有成績，我們也是贊揚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們就應該批評。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們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政党，我們当然應該贊揚。人民也有缺点的。

无产階級中还有許多人保留着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們在斗争中的負担。我們應該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們，幫助他們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錯誤作斗争，使他們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們在斗争中已經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們的文艺應該描写他們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錯誤的人，我們就不應該只看到片面就去錯誤地譏笑他們，甚至敌視他們。我們所写的东西，應該是使他們團結，使他們进步，使他們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揚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工作对象問題，就是文艺作品給誰看的問題。在陝甘寧边区⁽¹⁾，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問題和在国民党統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職員、店員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統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絕了。在我們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們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

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

熟悉工人，不熟悉農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們的幹部。什麼是不懂？語言不懂，就是說，對於人民群眾的豐富的生動的語言，缺乏充分的知識。許多文艺工作者由於自己脫離群眾、生活空虛，當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語言，因此他們的作品不但顯得語言無味，而且里面常常夾着一些生造出來的和人民的語言相對立的不三不四的詞句。許多同志愛說“大眾化”，但是什麼叫做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應當認真學習群眾的語言。如果連群眾的語言都有許多不懂，還講什麼文艺創造呢？英雄無用武之地，就是說，你的一套大道理，群眾不賞識。在群眾面前把你的資格擺得越老，越像個“英雄”，越要出賣這一套，群眾就越不买你的賬。你要群眾了解你，你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在這裡，我可以說一說我自己感情變化的經驗。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干淨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干淨的；工人農

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为是髒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軍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資產階級学校所教給我的那种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較，就觉得知識分子不干淨了，最干淨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們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淨。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階級变到另一个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沒有这个变化，沒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一个問題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說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黨員作家，必須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識。但是現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說，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識，就是階級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們有些同志却把这个問題弄顛倒了，說什么一切應該从“爱”出发。就說爱吧，在階級社会里，也只有階級的爱，但是这

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階級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資產階級的很深的影響。應該很徹底地清算这种影響，很虛心地学习馬克思列寧主义。文艺工作者應該学习文艺創作，这是对的，但是馬克思列寧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應該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說，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階級，研究它們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狀況，研究它們的面貌和它們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們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問題，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問題及其他有关的問題上发表意見。

結 論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同志們！我們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爭論，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話，把問題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們討論問題，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

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結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區別；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

群眾的問題。不解決這兩個問題，或這兩個問題解決得不適當，就會使得我們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環境、任務不協調，就使得我們的文艺工作者從外部從內部碰到一連串的問題。我的結論，就以這兩個問題為中心，同時也講到一些與此有關的其他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們的文艺是為什麼人的？

這個問題，本來是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列寧所早已解決了的。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着重指出過，我們的文艺應當“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2〕。在我們各個抗日根據地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同志中，這個問題似乎是已經解決了，不需要再講的了。其實不然。很多同志對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明確的解決。因此，在他們的情緒中，在他們的作品中，在他們的行動中，在他們對於文艺方針問題的意見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發生和群眾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實際鬥爭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當然，現在和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在一起從事於偉大解放鬥爭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學家、藝術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雖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暫時的投機分子，但是絕大多數却都是在為着共同事業努力工作着。依靠

这些同志，我們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績。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許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許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經历过許多辛苦，并用他們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說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問題沒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們还有主張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剝削者压迫者的嗎？

誠然，为着剝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階級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統治階級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頗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階級的，这是资产階級的文艺。像魯迅所批評的梁实秋⁽³⁾一类人，他們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階級的，但是他們在实际上是主張资产階級的文艺，反对无产階級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張資平⁽⁴⁾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們，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們曾說，現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階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現在一定是无产階級领导的。资产階級领导的東西，不可能屬於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

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傳統，我們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們也并不拒絕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們手里，給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東西了。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所以我們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为农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軍。第三是为武装起來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資產階級劳动群众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够长期地和我們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們的文艺，應該为着上面說的四種人。我們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階級的立場上，而不能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資產階級立場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人民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們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上面。而我們現在有一部

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他们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

朋友，不善于描写他們；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們的感情，不爱他們的姿态，不爱他們的萌芽状态的文艺（牆报、壁画、民歌、民間故事等）。他們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裝飾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棄它們，而偏爱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乃至資產階級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方面，或者換句文雅的話說，他們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問題他們就还是沒有解决，或者沒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軍、新四軍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許多是沒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問題，非有十年八年的長時間不可。但是時間無論怎样长，我們却必須解决它，必須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們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漸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產階級这

方面来。只有这样，我們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个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过去有些同志間的爭論、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則的問題上，而是在一些比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則的問題上。而对于这个原則問題，爭論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輕視工农兵、脫离群众的傾向。我說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說，这些同志的輕視工农兵、脫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輕視工农兵、脫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問題不解决，其他許多問題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說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則問題，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軍，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則宗派主义問題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魯迅曾說：“联合战綫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們战綫不能統一，就证明我們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綫也就統一了。”⁽⁵⁾这个問題那时上海有，現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問題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統